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

元人總集叙錄

王媛 著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

元人總集叙錄

王媛 著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元人總集叙錄 / 王媛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8.2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

ISBN 978-7-5528-0655-7

I. ①元… II. ①王… III. ①中國文學 - 古典文學研究 - 元代 IV. ①I206.4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29527號

元人總集叙錄

王媛/著

出版人/張瑋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號 郵編300051)

<http://www.tjabc.net>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3 字數 326 千字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655-7 定價: 39.00 圓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張榮強

委 員（按姓氏筆畫排序，排名不分先後）

毛瑞方 李 鳴

周少川 張文澍

韓格平 魏崇武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

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

總序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有 30 餘年的歷史。1981 年，原國家教委批准北京師範大學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本所是全國第一個古籍整理研究機構，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直接聯繫的重點研究所之一。2008 年，經北京師範大學批准，古籍整理研究所更名為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研究院設置中國古典文獻學教研室、中國歷史文獻學教研室、陳垣研究室和元代文化研究中心四個教學科研機構。

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的學術傳統悠久。陳垣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一代文獻學大師，著名學者白壽彝、啓功、郭預衡、劉乃和、許嘉璐、李修生、曾貽芬等先生都曾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他們所秉持的學術傳統，對本院學術研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本院的學術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元代文化研究、陳垣文獻學研究為重點研究方向，關注文獻學研究前沿動態，重視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相結合的研究工作。

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的學術積累深厚，出版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其中《全元文》獲 2006 年第四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被列為北京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三大標誌性成果之一。《文史英華》《古本戲曲劇目提要》《陳垣年譜配圖長編》《元代書院研究》《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全魏晉賦校注》《元人別集叢刊》《元代古籍集成》《中華大典·文獻目錄典》等專著和

古籍整理成果，受到學術界的贊譽。本院先後承擔國家和省部級項目 40 餘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2 項、重點項目 1 項，國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 1 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1 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委托重點項目 1 項。本院與海內外高校和科研機構有廣泛的學術交流。

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是全國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基地之一，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歷史文獻學博士及碩士點。其中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國家重點學科，中國歷史文獻學所在的中國史專業全國排名第一。本院先後招收碩士研究生 200 餘人、博士研究生近 50 人，還有一大批訪問學者。此外，有多名研究生赴海外高水平大學參加聯合培養或攻讀博士學位。本院的人才培養工作，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評價。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號召培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之成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文化建設的繁榮，為我院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契機。為了更好傳承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前輩學者的治學精神，進一步推動學科與學術的發展，我們決定編輯《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陸續出版我院學者的學術論著，集中展示我院的學術實力，並以此推動古文獻學科的發展，同時也為當代文化建設貢獻我們的力量。

前言

總集是中國古代詩文集的一種重要形態，其特點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彙集不同作家詩文作品而成一書。古代總集編纂的歷史很早，如果單考慮內容構成，成書於先秦時期的《詩經》和成書於漢代的《楚辭》都可以視為詩歌總集。但《詩經》作為儒家經典之一，傳統目錄學中將其歸入了經部，而《楚辭》從創作到流傳都擁有獨立的系統，傳統目錄學中在集部之下單設“楚辭類”以著錄《楚辭》及其續編和相關研究著作，因此這兩類都被摒除在總集之外。總集的產生不僅是為了彙聚和保存文獻，也是由於古代詩文作品汗牛充棟，難以窮盡，全面翻檢頗費時間精力，有必要從大量作品中選出最為精華的部分，以便於讀者閱讀和學習。根據編纂目的、收錄內容的差異，可以分為全編性質的總集和選編性質的總集。全編性質的總集着力於搜集一時、一地、一類之文獻，網羅放佚，不遺餘力。選編性質的總集偏重於文獻汰擇，從浩瀚的文獻中依照某種選錄原則將詩文選錄出來，去蕪存菁。

就元人總集而言，儘管現存數量僅有七十多部，內容卻非常豐富。根據編纂宗旨和收錄情況，大略可以劃分為五類：一是選編前代詩文詞曲，二是選編當代詩文詞曲，三是地方或家族詩文彙編，四是文人雅集唱和詩文彙編，五是科舉考試或民間日用文章彙編。

元人總集由於保存許多已經亡佚或者沒有詩文集流傳的作家作品，對於今天整理文獻、認識歷史很有意義。例如，《全元文》在編纂過程中利用了很多元代總集進行輯佚，但仍然有一些遺漏，僅《元賦青雲梯》三卷能夠輯錄的佚文就有莊文昭《蒲輪車賦》、林溫《浙江賦》、召公任《暘谷賦》、陳祖仁《暘谷賦》、林溫《天爵賦》、

陳高《銅柱賦》、胡斗元《彭蠡賦》、劉于《彭蠡賦》、梁思立《岱宗賦》、王元裕《彤弓賦》、凌雲翰《彤弓賦》、徐恢《九章賦》、陳麟《九章賦》、蕭應麟《雲臺賦》、趙麟《禹門賦》、金綱《禹門賦》等十餘篇。元代總集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元人文獻，也保存了不少唐宋文獻，有些尚未被學界充分利用，如孟宗寶編《洞霄詩集》（雒竹筠《元史藝文志輯本》未錄）中所載宋代陸維之《洞霄宮》《寄對閑堂》、王思明《求洞霄宮碑謝別陸放翁》《山居》《雨後過松風庵》《觀棋》《聞蟬》、貝守一《逍遙吟》《適意》《自適》《有何不可》《冬晴晚步》《絕句》等詩，為《全宋詩》所失收，可據以補輯。即此兩例，可見元人總集的文獻價值尚待充分挖掘。

元代的選編性總集有助於我們認識宋元時期文學風氣與文學思想的發展變化。宋代中後期，“永嘉四靈”開始倡導唐詩以矯正“江西詩派”晦澀艱僻的詩風，“江湖詩派”又繼續推演宗唐風氣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宋末詩人編選了一些唐詩總集。周弼《三體唐詩》集選與評為一體，嚴格區分唐詩諸體的文字虛實特徵，以此作為判別詩歌藝術高低的依據，反映了晚宋詩人對於詩歌創作藝術的探索成就。金末元好問《唐詩鼓吹》也選錄了許多晚唐詩人的詩歌，受到後人的批評，但此編所選詩歌更偏向於遒健宏敞的風格，與江湖詩歌的貧弱淺薄不可同日而語。宋末元初，方回《瀛奎律髓》同樣未能突破中晚唐詩的巨大影響力，所選仍以中晚唐詩為主，但對於江湖詩風有自覺的反思，處處對姚、許持批評態度。後人批評《三體唐詩》《唐詩鼓吹》“所取皆晚唐之最下者”，其實這正是當時詩壇風氣的體現。直到元代中期楊士弘《唐音》出現，唐詩選本才突破了中晚唐的局限。

總集中對詩文的分期，直接體現了古人文學史觀念的發展和演變。以楊士弘《唐音》為例，此書按時代先後編次，將唐代詩人劃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這一分期觀念被明代高棅《唐詩品彙》沿用以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在今天的文學史教材

中仍然被採用。元人總集對詩文辨體風氣的推助也是不可忽視的。例如辭賦辨體方面，祝堯《古賦辨體》首次對古賦進行了辨體，大大推動了對賦學的認識；詩歌辨體方面，楊士弘《唐音》將唐代詩歌分為五七言古、律、絕，排律只是附錄於五七律之後，而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選》第一次對“排律”進行編纂並以此為書名，使得向來附屬於五七言律詩的長篇律詩“排律”有了獨立的文體地位。

總的來說，總集雖然不能如別集一樣集中反映某位作家的全部創作情況，但它更直接地體現當時文學風氣的趨向。許多編選質量很高的總集被後世當作課授兒童的基礎讀物，對於文學風氣的實際影響遠遠大於一般的文人別集，很值得整理出版和深入研究。《四庫全書》《四部叢刊》《續修四庫》《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華再造善本》等大型叢書中均收錄了元人總集。已經整理出版的總集有隋樹森點校《梨園按試樂府新聲》（中華書局 1958 年）、《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中華書局 1958 年）、《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中華書局 1957 年）和《類聚名賢樂府群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等詞曲總集，韓成武等點校《唐詩鼓吹評注》（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0 年），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張正義、劉達科校注《河汾諸老詩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楊鐮點校《玉山名勝集》《玉山璞稿》和《草堂雅集》（中華書局 2008 年）等總集。目前對於元代詩文總集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詞曲總集和重要文人編纂的總集，大多數元人總集尚未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仍有必要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

由於種種原因，明末以來多種《補元史藝文志》中關於元人總集的著錄存在不少疏漏訛誤之處，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以錢大昕《元史藝文志·集部·總集類》為例，著錄疏誤之處就有很多（以下所引皆據《潛研堂全書》本）。如“王玠，《唐詩選》，定海人”，即沿襲自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八三《經籍考》：“《唐詩選》，定海王玠纂。”今檢明《嘉興府圖記》卷一五《人文》載：“黃正孫……

子玠，字伯成，與趙孟頫游，尤與黃潛善。……所著有《弁山小隱吟錄》《知非舊稿》《唐詩選》，纂《韻錄》行世。”又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六《慈溪黃君墓誌銘》云：“慈溪黃君卒於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來諗於潛，曰：葬宜有銘，敢以為請。……君諱正孫，字長孺……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可見此編作者當為黃玠，而非王玠。又如“《萬寶書山》三十八卷”，顯然有誤。晁瑬《寶文堂書目》著錄“《萬寶詩山》，宋刻國朝序”，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二《月字號第一厨書目》著錄“《萬寶詩山》一部十三冊”“《萬寶詩山》一部一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二著錄“《萬寶詩山》三十八卷”，可知是編當名為《萬寶詩山》。是編清代屢見藏書目錄記載。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五《集部·總集類四》載：“《選編省監新奇萬寶詩山》三十八卷，宋書林葉氏廣勤堂刊本，宋葉景達編。”卷首有莆陽余性初《叙》，作於“□雍作噩歲重九日”，所闕字當為“屠”字，“屠雍作噩”即己酉年。陸心源又云：“此宋書林葉氏廣勤堂刊本，每頁三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宋時兔園冊也。”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卷一亦載：“《萬寶詩山》三十八卷，宋巾箱本。每卷題首云‘選編省監新奇萬寶詩山卷之幾’，書林葉氏廣勤堂新槧，悉取宋代省監所試五言六韻詩分類編錄，如今坊間《褒珍試律大觀》之比，每卷約五十葉，葉三十行，行二十三字，三行一詩，約四百六七十首，合三十八卷，計之約詩萬六千餘首。宋人帖體亦收羅殆盡矣。”清人多以此本為宋板，其實卷首余性初《叙》云：“書林三峰葉景達氏掇拾類聚，繡梓以傳，於世目之，曰《萬寶詩山》，俾後學者有所矜式，其用心亦弘矣。梓成，携以示余，因屬余叙。”由此可知，是編出自建陽書林葉景達之手。葉景達是明代宣德、正統間人，所刊書籍至今仍有不少傳世，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錄》、潘景鄭《著硯樓書跋》、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錄》等已相繼辨明這個問題。又如“《甘棠集》一卷”，下注：“至元間浦江

人爲縣宰廉阿作。”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均未收此書。此條當據孫能傳《內閣藏書目錄》卷八所載：“《甘棠集》一冊全，元至元間廉阿宰浦江，及致政，浦人去思諸詩也。”據陳高華先生考證，此“至元”當爲元惠宗年號，浦江縣宰以廉爲姓者爲畏兀兒人廉阿年八哈。邑人胡助《純白齋類稿》卷一八《廉侯遺愛傳》云：“婺之支縣曰浦江，自入國朝以來，凡所更長官二十餘人，求其德政愛民與古之魯卓並稱無愧者，今惟見廉侯一人而已。侯名額琳巴哈（筆者按：譯名不同，爲清人所改），一名浦，字景淵，北庭人也。”可知“廉阿”乃廉阿年八哈之誤，錢《志》沿明人著錄而脫三字^①。又如“《名公書判清明集》十七卷”，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集部》：“《名公書判清明集》殘本，二百三十二頁，宋刊本，不著編輯者姓氏。……景定歲酉日，長至幔亭□孫引。”可知《名公書判清明集》應爲宋人所編，不當著錄入《元史藝文志》之中。嵇璜《續通志·史部·刑法類》置於元彭天錫“《政刑類要》一卷”之下，錢《志》蓋沿其誤。又如“陳士元《武陽耆舊詩宗》一卷”條，“《武陽耆舊詩宗》”當作“《武陽耆舊宗唐詩集》”，《邵武府志·藝文》（乾隆二十五年刊）載黃鎮成《武陽耆舊宗唐詩集序》，云：“宗唐詩者，武陽耆舊之所作也。”黃《目》誤爲《武陽耆舊詩宗》，倪《志》、錢《志》蓋沿其誤。又如“《東甌遺芳集》止錄趙氏數人”條，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卷三二《集部》載：“元《遺芳集》，《東甌續集叙》所述無‘東甌’二字，錢氏《元史藝文志》始增題此名。其撰人無考，以專錄趙氏詩，推之疑即卓忠貞所叙趙廷暉《遺芳集》也。其書今無傳本。”今案：“東甌”二字確爲臆增。檢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四《經籍》著錄：“《東甌遺芳集》，趙諫《東甌續集序》：元人撰，止錄趙氏數人而不及他

^① 陳高華：《讀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哲學部集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42頁。

姓。”可知《元史藝文志》乃沿《浙江通志》之誤。又如“《徐氏雙桂集》，伯樞衍，無錫人”條，《徐氏雙桂集》今已不傳，然乾隆時期四庫館中嘗採進一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集部·總集存目一》：“《雙桂集》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明徐塤編。塤，無錫人，是集錄其祖環、父允之詩。環字伯樞，元兵部侍郎憲之子。洪武間嘗以茂才薦，擢上元縣主簿，終臨桂縣丞，所著有《臨桂集》。允字邦孝，所著有《水南集》。塤合爲一集刊之，統名曰‘雙桂’。朱彝尊《明詩綜》蒐羅至三千四百餘家，而環父子之詩不載一字，然其詩皆未成家，疑彝尊刪之，未必不見也。”然則此編當爲明人徐塤所輯，錄徐環、徐允之詩。錢氏不獨誤著此編於《元志》，又著編者爲“伯樞衍”，可謂誤中生誤。又如“高德進《自得齋類編》”條，錢《志》題編者爲“高德進”，檢徐一夔《始豐稿》卷二《自得齋類編序》：“河南高公德進甫有藏修之室曰自得齋，既得宗工鉅儒爲之論著，而先隴白雲山舍亦皆有述。其子巽志慮其久而散軼也，彙而次之，合記、序、銘、贊、誌、狀、詩、詞凡若干首，將鋟諸梓，題曰《自得齋類編》，而請余序。”可知編者當爲高巽志，德進乃其父之字。

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卷四《集類》中除了“總集類”著錄的典籍，其他二級類目下也有不少典籍被今人視爲總集。如“制誥類”著錄的“蘇天爵《兩漢詔令》”“虞廷碩《歷代制誥》五卷、《詔令》四卷”也可以視爲總集。其中第一種“蘇天爵《兩漢詔令》”，檢《滋溪文稿》卷六《兩漢詔令序》載：“是編吾家所藏西漢十二卷，吳郡林慮錄。東漢十一卷，四明樓昉錄。及官浙省，與憲使王公議刊行之，向聞於潛洪咨夔亦嘗纂次成書云云。”可知此編乃林慮、樓昉所輯，著入《元史藝文志》則誤矣。

“詞曲類”中著錄的“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也是一部流傳至今的散曲總集，楊朝英所編還有《陽春白雪樂府新聲》，在錢《志》中未見著錄，這類疏漏並非個例，這裡暫不一一列舉，僅舉數

例證其訛誤之處。如《百一選曲》《陽春白雪集》兩種，毛扆以爲元人所編，錢大昕沿其誤著錄入《元史藝文志》中。毛扆跋精鈔本《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云：“章丘李中麓開先曉音律，善作詞，最愛張小山，謂其超出塵俗。其家藏詞山曲海，不下千卷，獨不得小山全詞，僅從選詞八書（自注：《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百一選曲》《樂府群珠》《詩酒餘音》《仙音妙選》《樂府群玉》《樂府新聲》）輯成二卷，名曰《小山小令》，序而刻之家塾。”他認爲李開先曾從《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百一選曲》等八部書中輯錄張可久小令。如果這八部書果真載錄張可久的小令，當然應該是元人所編。但實際上毛扆誤解了李開先的意思。李開先《閑居集》卷六《張小山小令後序》言：“予自游鄉校讀書，或有餘力，則以學詞。詞獨愛張小山之作，以其超出塵俗，不但癯勁而已。當時苦於無書，止有楊朝英所集《太平樂府》，及檢舊篋，又得《陽春白雪集》及《百一選曲》兩種。……其小山詞載在《樂府群珠》《詩酒餘音》者僅有數十曲，他所更得《仙音妙選》《樂府群玉》《樂府新聲》，則有助於小山多矣。”李開先提到《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百一選曲》三部書，是感慨當時詞曲集子難尋，手頭僅有這三部書，並非從這三部書中輯錄張可久小令。事實上，李開先所言《陽春白雪》並非楊朝英編《陽春白雪樂府新聲》，而應該是宋人趙粹夫《陽春白雪集》，朱彝尊《詞綜·發凡》云：“至如曾慥《樂府雅詞》《天機餘錦》采入《花草粹編》，趙粹夫《陽春白雪集》見李開先《小山樂府後序》，則諸書嘉、隆間猶未散帙。”而趙粹夫《陽春白雪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已有著錄，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六《經籍考》云：“陳氏曰：趙粹夫編取《草堂詩餘》所遺，以及近人之作。”（此條四庫本《直齋書錄解題》失輯）趙粹夫既爲宋人，李開先當然也不可能從《陽春白雪集》中輯錄到張可久的小令。同樣地推理，《百一選曲》既非輯錄《小山樂府》的文獻來源，是否屬於元人所編就不能確定了。又“《樂府混成集》一百五冊”條。此條當本於黃虞稷《千

頃堂書目》卷二所載，黃氏誤錄於“元”以下。其書明代尚有流傳。孫能傳《內閣藏書目錄》卷四載：“《樂府混成集》一百五冊，不全，莫詳編輯姓氏，皆詞曲也。內有腔板譜，分五音十二律，類次之。原一百二十七冊，今闕二十二冊。”而從內容和卷帙上看，此書當即南宋官府編刊之《混成集》。周密《齊東野語》卷一〇“混成集”條所載：“《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祇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樂府混成集》原本一百二十七冊，流傳至明代僅存一百五冊，而錢《志》不僅著錄於元代，且所著錄為殘本冊數，顯然不够正確。又“群英詩餘”條。此書明清時罕見流傳，僅晁瑛《寶文堂書目》著錄有《群英詩餘》，《季滄葦藏書目》也著錄有“《類選群英詩餘》二本”^①，其實這是宋人何士信所選《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的簡稱，錢大昕著於《元志》，可謂大誤。又《天機碎錦》《片玉珠璣》二種，當來自朱彝尊《詞綜·發凡》。案《詞綜·發凡》云：“《天機碎錦》《片玉珠璣》二集，聞江都藏書家有之；又如《百一選曲》《太平樂府》《詩酒餘音》《仙音妙選》《樂府新聲》《樂府群珠》《樂府群玉》，曲海之內，定有詞章可采，惜俱未之見也。”可見《天機碎錦》《片玉珠璣》二集，竹垞皆未親眼目睹，而各種書目上也未見諸記載，能否斷為元人所編尚需存疑。又“曲海”條亦據此。但是前人所引只有《曲海叢珠》，《詞綜·發凡》所載其餘諸集皆未簡省至二字，因此有學者認為竹垞所云“曲海”並非集名，而是一個泛稱。又“詩話總龜”“詞學筌蹄”條。《詩話總龜》乃宋代阮閱編，

① 季滄葦所藏為元至正辛卯孟夏雙璧陳氏刊本，現存於國家圖書館。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著錄“宋何士信輯《增修箋注妙選草堂詩餘》（元刻元印）”，云：“卷首有‘季滄葦藏書’一印，延令（季振宜）書目載《類選群英詩餘》二本，即此書也。此本前後集前又各具細目，題‘妙選箋注群英詩餘’，次行低五格有‘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實編選’一行。”

成書於徽宗宣和年間知郴州時。而《詞學筌蹄》則為明人周瑛編著，林俊《見素集》卷一九《明進資善大夫四川右布政使致仕例進一階翠渠周公墓誌銘》載：“所著有《翠渠集》《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龜》《周易參同契本義》。”可見此二書不當著錄在《元史藝文志》中。

清代以來，補《元史藝文志》不止一家，諸書體例不同，對元人總集範圍、數量的著錄也存在差異，但互相沿襲的情況還是很明顯的。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沿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及倪瓚《補元史藝文志》，晚清魏源撰《元史新編》、曾廉撰《元書》則沿用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以上所舉疏誤以訛傳訛，實有考訂清楚之必要。更重要的是，史志目錄的體例沒有注明存佚情況，很不便於今人利用。雒竹筠《元史藝文志輯本》雖著明存佚，但有些書僅為雒氏所經眼，具體典藏情況並不清楚，讀者利用很不方便，需要重新調查。此外，元人總集中真偽雜陳的狀況也頗能混淆視聽，不僅造成對典籍源流的誤解，而且不利於相關學科研究的開展。例如佚名編《宋遺民錄》一卷，內容雜亂，收錄了元之色目人迺賢與元名臣黃潛、吳師道，粗編濫造，望而可知。《四庫全書總目》已指出其偽，可惜未能提供具體證據。筆者逐一檢查所收詩文內容，發現全出於程敏政所編的十五卷本《宋遺民錄》，詩文前後次序全都相同，可見一卷本《宋遺民錄》應該是從十五卷本《宋遺民錄》中摘錄出來的，基本沒有什麼文獻價值。又如托名陳世隆編的《宋詩拾遺》《宋高僧詩選補》《兩宋名賢小集》《宋詩外集》，這些典籍在清初之前未見著錄，清代以來也僅見一二鈔本流傳，文獻傳承十分可疑。再細考這些典籍的內容，多有錯訛，所錄宋詩既有唐人之作，也有許多元明人之作，足以證明並非元人所輯，而是出自清人偽編。這些典籍從出現以來一直被學界視為重要的宋詩總集，作為可靠文獻加以徵引利用，清代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據以補輯宋詩，當代學者也借以編輯和補輯《全宋詩》，因而產生了許多錯誤。對於這些

文獻，重新確定其性質是有必要的。

有鑒於此，本書試圖以叙錄的形式，系統梳理和研究元人總集中各個方面的問題，力求將內容叙錄和版本叙錄結合起來，盡可能全面地敘述每部書的作者生平、編纂體例、優劣得失、思想內容等方面的情況，以及歷代傳本的卷帙分合、刊行、流傳歷程，評述主要傳本的優劣得失，並仿照《文獻通考·經籍考》《經義考》的體例，搜集一些主要版本的重要序跋附錄於每則叙錄之後，為學者利用元代總集進一步提供方便。部分元人總集版本系統已經有人梳理並撰寫論文，有些甚至還整理出版了，本書有所參考並引用其觀點，都會注明出處。一些還沒有被充分重視的版本，則力求全面介紹其價值。但由於條件的限制，有些版本筆者未能親眼目睹，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本書在撰寫過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潘建國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陳偉文老師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寧研究員、張劍研究員的幫助和指導，諸位先生提出的寶貴意見對於本書的修改和完善深有裨益。復旦大學羅琴博士幫我查閱藏在上海圖書館的《在茲篇》的唯一版本和另外幾部總集的重要版本，使本書得以彌補若干缺陷。天津古籍出版社劉艷艷老師在本書出版過程中付出了辛苦的勞動。在此謹表謝忱。對於本書可能存在的錯誤和不足，敬請同行專家不吝指正。

王媛

2017年1月3日